

先谈记忆 再说传承

——漫谈《通榆年画记忆》

●葛筱强

收到白城师范学院美术专业教授邹义勐先生赐赠我的《通榆年画记忆》一书两年有余了，每每看到这本书都让我感到温暖。温暖义勐先生能够把专业研究与故乡特色文化结合起来，是刻着乡情的温暖，也是年画艺术映照热爱文明之人时那种深情凝望的温暖。

小时候每逢过年，父母定会节省下几毛钱买张年画，粘贴在墙壁上，让贫穷的日子多了些许光亮，有《八大锤大闹朱仙镇》《花为媒》《四婢图》《李自成》等。读了义勐先生的书才知道，《花为媒》《四婢图》《李自成》的作者都是通榆年画家刘长恩先生。

作为一部地域文化专著，义勐先生从“年画的起源与发展述略”、“通榆年画概说”、“通榆年画的地域风情”、“通榆年画的内容题材”、“通榆年画的艺术特征”、“通榆年画的价值与影响”、“通榆年画的保护与传承”、“通榆年画作品赏析”和“通榆年画文化产业的开发利用”等九个方面，对通榆年画这一吉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成长历程、艺术特色与文化价值，进行了条分缕析、十分

周详恰切地叙述与论说，铺陈简练，点批精准，化错综复杂的史料为明白晓畅的文字，在保持全书学术严谨精确的同时，亦偶有不自禁地抒情灵光乍现，于不经意间增添了旨趣与情思。如在研究通榆年画的地域风情时，作者写道，“仲春之时草原生发、布谷初啼的斑驳景象，盛夏季节草长丰美、牛羊漫步的恬淡风情，中秋时分遍野金黄、挥刀动锄的丰收场面，寒冬雪霁漫山皆白、如琼似玉的萧瑟凄美，草原一年四季都有景可观，有图可绘，有情可叹。”再如作者论及通榆年画的文化价值时说，“灵动的笔墨或轻如蝉翼或重若崩云，清新雅致，意气风发，尽在神采间，寓情于笔，寄情于形色间。”只言片语，亦是吉光片羽，作者信手拈来的句子把通榆年画的创作背景与创作特点表达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这既彰显了作者深厚的学术根基，也透露出作者骨子里天然的美学倾向。

没有记忆的民族艺术是可疑的，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会走得更远；而没有传承的民族艺术也是可悲的，犹如枯木难苗新枝，让人看不到蓬勃未来。任何艺术形式

必须在记忆中传承，在传承中生出新的记忆，才能形成宏大的艺术气象，散发出令人沉醉的感召力。义勐先生近年来专心于潜故纸，拨寒灰，走田野，访旧人，钩沉辑轶，刮垢磨光，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这部《通榆年画记忆》，其心也赤，其绩也灼。他的劳动，正如英国作家菲利普·威尔金森在《符号与象征》一书所说“为了构架信仰，我们发明了一套符号和象征物，并将其不断地发展、丰富，使之成为信仰的一部分。这些符号提醒我们，人类与宇宙的和谐统一。”毫无疑问，通榆年画作为一种视觉符号与象征物，它所呈现和表达的，既有草根一样的底层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与追求，亦有更为深广的文化思想与精神寄托裹挟其中。通榆年画当之无愧是人类文明逦迤前行中的一支火把，即使它的火焰不能照亮整个辽阔的旷野，但一定会照彻每一个热爱它的朴素灵魂。

义勐先生的这部专著，所想所愿也无非是盼望通榆年画这支火把，在通榆大地上永不丧失它的接力者，让这缕文明之火恒远传承。



『我们追求有价值的收视率』

专家评议中国电视节目如何创新创优

●新华社记者 姜潇

中国电视如何走出复制翻拍、同质化的困境？收视率面前，有思想的节目如何能叫好又叫座？当真人秀对准的是普通人的真情实感时，效果又如何？在近日召开的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创优研讨会上，《开讲啦》等6档优秀电视节目的代表分享了他们的成功经验，并与与会专家一道，探讨怎样才能制作出更多品质精良、形态鲜活、创新创优的电视节目。

收视率面前 电视节目该拒绝“思考”？

“按照收视率的逻辑，‘电视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观众就换台’，电视注定要热闹而拒绝思考吗？”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认为，以中央电视台《开讲啦》、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为代表的有一定思想性的电视节目，成为冲破收视率牢笼的成功案例。

在《开讲啦》的舞台上，没有提示器，没有演讲稿，15分钟的即兴演讲时间里，嘉宾只能独自一人站在舞台中央——这却是一种最真实的状态。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表演艺术家李雪健，到篮球巨星姚明、神探李昌钰、宇航员杨利伟……各个领域的140余名嘉宾，在节目中真诚分享了他们的不同人生。

有思想的节目不是艰涩的话语和生硬的表述，有贴近性的语态才更容易让思想迸发巨大能量。令中国地质大学研三学生夏凌娟印象最深的一期公开课中，一个有关财富观的问题引出现代青年人财富的追求高于对健康的诉求这一社会现状。“对此，嘉宾汪建老老师告诉大家要克服浮躁，管住嘴、迈开腿，追求精神财富，令我受益匪浅。”夏凌娟说。

“中国电视不能做收视率的奴隶。”时统宇认为，毫无思想性的节目好比得了软骨症，我们要将更多有思想、有筋骨的电视节目呈献给观众。

作品的真正情怀就在老百姓的故事里

近年来，对一些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的指责声不断，真正反映老百姓真实生活的节目在哪里？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副秘书长周然毅认为，央视的《等着我》、北京卫视《生命缘》和东方卫视《急诊室故事》为代表的三档节目，真实纪录反映普通人的的人生经历，道出群众心声，抒发百姓情怀，用温暖、坚强、友爱的质朴情感感染和打动了观众。

新一季《生命缘》里，讲述了一名身患脑瘤的6岁女孩丹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主动捐出自己的器官，成功救治了5名患儿的感人故事，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周然毅认为，这档在同时段收视排名前三、网络点击率过亿次的电视节目，用直抵人心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以生命的名义传递真善美，普通百姓的故事蕴含真情实感，这才是我们追寻的有价值的收视率。”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邵晶如是说。

勇于创新方能化蛹成蝶

一直以来，中国电视复制翻拍问题屡被诟病，“同质化现象是中国电视的一个普遍现象，一个好节目来了，大家都去拷贝，或者引进成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俞虹说，《最强大脑》等节目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传媒人的再创新能力，并且在节目中深深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

“《最强大脑》虽然是一档引进版权的节目，但实际上对原版节目做出了颠覆性的本土化改造。”江苏卫视频道总监李响说，“一档科学节目，引起全民围观，‘让科学流行起来’不再只是一句口号。”

“大学教授加入，让科学从幕后走向台前，也增强了节目的学人气息和科学精神。”俞虹认为，节目中众多最强大脑的奇人出现，更让人们发现了人自身的潜力和奇迹，领略到科学的魅力。

研讨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透露，总局正在研究制定推进节目创新创优的指导性意见，要发挥政策杠杆作用，充分调动有利于创新创优的各种积极因素，并将着力优化节目的整体布局，让更多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节目进入好时段。

陕西六大佛教祖庭将打包“申遗”

●新华社记者 陈昌奇

近日，记者从陕西省文物局获悉，陕西境内的大慈恩寺、大兴善寺、草堂寺等六大汉传佛教祖庭将打包“申遗”。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在传播中逐渐中国化，形成八个流派，其中六大流派的祖庭都在陕西，分别是法相宗的大慈恩寺、密宗的大兴善寺、三论宗的草堂寺、华严宗的华严寺、律宗的净业寺，以及净土宗的香积寺。家喻户晓的玄奘法师，就是法相宗的代表人物。

据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所负责人介绍，陕西正在筹备将汉传佛教六大祖庭打包“申遗”的工作。从去年9月已开始陆续收集整理资料，目前进入计划申

请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阶段，待国家文物局对全国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调整和审定，将确定最后能否继续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汉传佛教六大祖庭包括：

大慈恩寺：著名佛教寺院，唐长安四大译经场之一，中国佛教法相宗祖庭，迄今已有1350余年历史。大慈恩寺创建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玄奘法师曾在这里主持寺务，领管佛经译场，创立中国佛教宗派法相宗。

大兴善寺：相传初建于西晋，隋文帝开皇二年迁寺至新都大兴城靖善坊，始称“大兴善寺”。唐开元四年至八年，“开元三大士”先后来此传授密宗并译佛经，使这里成为当时长安城

“抗日神剧”这样的艺术“杂草”该锄锄

●新华社记者 杨洋 郁琼源

“艺术需要娱乐大众，但要有度，不能哗众取宠到丑陋的地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濮存昕5月20日在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近期引发热议的“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等情节出格的“抗日神剧”是艺术的“杂草”，规范艺术“园地”需要时常“锄锄草”。

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林兆华执导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作品《建筑大师》5月19日、20日在清华大学演出两场，濮存昕和陶虹主演。

“在尊重商业文化、市场艺术的同时，别忘了讲规矩。”濮存昕表示，艺术要给人美的体验，引导向上的力量。“面对艺术市场存在的‘杂草’，要用锄头锄一锄，用剪刀修一修，艺术的‘园地’才能更美好。”

作为一名话剧、电影、电视等“多栖”演员，濮存昕认为演戏有三层境界，第一层是可看，第二层是可赏，最高层次是可品。“剧场艺术能够滋养一个城市的品格，提升民族气质。演员应该努力追求更高的层次，多演真正触动观众心灵的作品，

提升观众的艺术品味。”

数字化时代，电视剧和电影以低廉的价格为人们提供了休闲娱乐的方式，而戏剧等舞台演出因票价昂贵而让不少观众望而却步，戏剧的生存空间受到一定挤压，戏剧如何生存？如何走向寻常百姓家？

濮存昕谈到，从1977年开始从事戏剧表演，他深切感受到舞台的艺术魅力不可替代。“拷贝艺术永远不能代替面对面的交流，话对话，眼对眼，台上台下互动，舞台表演带给观众的这种身临其境之感，是屏幕无法代替的。”尽管舞台演出消费价格较高，但对很多观众而言，晚上走入剧场，欣赏高雅的戏剧节目，从中得到情感的共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高雅艺术向大众普及，应从大学教育抓起。”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书记赵洪说，为了在教学中普及高雅艺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清华大学于2011年成立艺术教育中心，4年来为学生提供了百余场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等艺术演出，丰富了学生文化生活。

寻访王二小：童谣背后的少年英雄

●新华社记者 王文化 任丽颖

“牛儿还在山上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最早唱响《歌唱二小放牛郎》的孩子已渐渐老去，而童谣里那个将日寇引入我军包围圈而牺牲的少年英雄形象，仍鲜活地跃动在太行山的记忆之中。

在河北平山、涞源都有王二小纪念馆，在河北顺平以至山西等地都有王二小式少年英雄的事迹流传。“六一”前夕，记者踏访太行山，从多个地方王二小伙伴、研究者口中，还原出多个王二小式的少年英雄，虽难以确认谁就是歌中所唱的那个少年，但能感受到，了那少年成为英雄所经历的苦难与磨砺，一首童谣背后，是一群少年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坚韧不屈，慨然赴死的壮烈。

太行山上的月光 养育着破村庄

“太行山上的月光，养育着破村庄，敌人来了奸淫烧杀他一心要抢光。……可怜我的爹妈死得那样惨，哭也没有用啊，喊天也枉然，只有大家组织起来打败日本保卫祖国才能有家乡。”

在平山县南滚龙沟村，86岁的史林山老人唱起了这首当年八路军叔叔教他的童谣。70多年前这个村曾是《晋察冀日报》所在地，日军多次来烧杀抢掠，全村400多口人有43被杀。1941年秋，13岁的儿童团长闫

李冰冰夺得伦敦国际华语电影节两项大奖

●新华社记者 夏晓 吴丛司

第三届伦敦国际华语电影节颁奖典礼近日在伦敦皇家庆典音乐厅举行，李冰冰获得最具海外影响力演员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

《智取威虎山》男主角张涵予获得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导演奖被《一个人的武林》的导演陈德森夺得，《匆匆那年》摘取最佳影片奖，《爸爸的假期》的导演王岳伦获得最佳编剧奖。另外，最佳男女配角花落古巨基（《冲锋车》）和唐嫣（《露水红颜》）手中，王丽坤获得最具实力女演员奖。

李冰冰、古巨基、王丽坤、张一白、陈德森、王岳伦、李湘等演员和电影人与众多英国电影界代表出席了颁奖典礼。

伦敦国际华语电影节主席孔祥曦在颁奖典礼上说，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通过电影了解一个国家绝不是一句虚言。中国电影不能只停留在票房层面，“拍电影要让更多人看到才会有更多合作的机会，才会有进步，才会获得更多的灵感，才会更好地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

国内知名制片人安晓芬在颁奖典礼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电影市场。目前，世界上有许多人愿意关注中国、与中国合拍电影，愿意去研究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我们需要加强主动性，学会和全球观众交流的方式。

第三届伦敦国际华语电影节5月13日在伦敦开幕，11部优秀华语影片在伦敦影院展映。除影片展映评奖外，电影节还举办了“华人明星走进伦敦”等活动。5月18日下午，《中国合伙人》编剧周智勇率最新导演的爱情励志喜剧电影《恋爱教父》剧组与华文媒体举行了见面会，并与影片主演明道、谢依霖、钱枫、矢野浩二共同亮相电影节。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首发

先民刻符“集大成” 汉字探源添新证

●新华社记者 冯源



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公认是甲骨文，若要再向上追溯，寻找中国文字的源头，这一问题迄今未解。《良渚文化刻画符号》近日在杭州首发，首度全面收录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也填补了国内史前刻符研究的空白，从而助力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

这本图录用3000多幅照片，以及相应的拓本、摹本与线图，全面收录和展示了迄今为止发现的良渚文化刻画符号。它们来自良渚文化多个遗址的出土器物，其中器物有554件，符号有656个，逾340种。器物以考古发掘器物为主，同时也兼顾传承有序的博物馆馆藏品。刻符有的看似动植物，有的则由纯粹的线条组成。

刻画符号一直是良渚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1937年，良渚文化研究的先驱施昕和何天行不约而同地报告了他们所发现的刻符。而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分布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诸多良渚文化遗址都出土了不少带有刻符的陶器、玉器和石器，但是资料分散。

为了帮助学术界深入研究，2012年，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余杭分会和良渚博物院启动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研究”课题，在浙苏沪多个博物馆和考古机构的帮助下，开始编撰这部图录。图录设立了索引，在不同遗址、不同器物上出现的相同刻符一目了然。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高蒙河教授表示，它填补了国内史前刻符纹饰资料的空白，对这方面学术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和更有潜力的空间。

中国考古学会前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一直主张中华文化存在五大基因文化谱系：西拉木伦河—辽河文化谱系、黄河上中游文化谱系、黄河下游文化谱系、长江中游文化谱系和长江下游文化谱系。他说，这五大谱系都有刻画符号，但如此完整地结集出版某一史前文化的刻符图录，在国内还是首次。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新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各个遗址被大量发现和发掘，刻符资料也极大地丰富起来。它们与已显成熟的甲骨文以及汉字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感兴趣和广泛争论的课题。张忠培表示，良渚文化刻符目前还是一个谜，难有定论，但是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大实证，因此，研究刻符，不仅有助于良渚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更有探源中华文明的作用。

距今约5300至4300年的良渚文化，因最早于1936年在余杭良渚镇被发现而得名。它是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考古学文化，以精美的玉器和宏大的古城最为著称，相关的考古成果多次跻身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主任刘斌研究员说，良渚先民能开展工程量浩大的建设、制作精美的玉器、形成社会阶层、建立成熟的礼制、实现社会的高效运作，若不依靠符号系统记录和传递信息，难以想象。他举例说，不少良渚陶器边沿上除了有一圈装饰性的符号外，必有一组相对的刻画符号，它们的含义就值得深究。

秋风吹遍了每一村庄 把这个动人的故事传扬

“秋风吹遍了每一村庄，把这个动人的故事传扬，每一个老乡都含着眼泪，歌唱着二小放牛郎。”

动人的童谣也引发过不少人的好奇心和责任心，这王二小到底是哪里人？老作家陈模曾写过纪实小说《少年英雄王二小》，作品中的王二小是涞源县上庄人，后记以“寻访王二小”为题，记述了1995年他寻访和确认王二小的过程。80岁的车志忠当年任涞源县政协副主席，曾陪着陈模在涞源调查，车志忠说，当年陈模在河北和山西找到了10个王二小式的少年英雄，最终认为涞源把日军引进包围圈而牺牲的小英雄王禾是王二小。

王禾的父亲是被日军所杀，哥哥也被抓走，对日寇有国仇家恨，是村里儿童团的积极分子。如今涞源有王二小希望小学和纪念馆。但《歌唱二小放牛郎》的作者冰心生前曾多次说王二小“是个复合人物，是综合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创作出来的。”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锡岚曾对王二小形象的传播过程进行过认真的梳理考证，她说：“当年晋察冀根据地到处都活跃着儿童团员身影，涌现出一批王二小式少年英雄，一首童谣背后，融合了许多真实的英雄事迹。正是有千千万万个王二小的觉醒和抗争，才在民族危亡之际筑起了我们新的长城。”